

| 文博大聊
库士学城

Containment and Confrontatio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1961 ~ 1973

吕桂霞/著

遏制与对抗 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 (1961 ~ 1973)



社会 科 学 文 献 出 版 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聊城大学博士文库

遏制与对抗

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

Containment and Confrontation:

Sino – American Relation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1961 ~ 1973

◆ 吕桂霞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聊城大学博士文库·

遏制与对抗

——越南战争期间的中美关系（1961～1973）

著者 / 吕桂霞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辑中心 (010) 65232637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范明礼

责任校对 / 刘芙蓉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亿方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 14

字 数 / 319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30 - 729 - 2/D · 220

定 价 / 3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1961～1973年，不仅是美国在越南的直接军事卷入时期，而且也是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美两国关系一方面因在越南的间接对抗一度严重对峙，另一方面，随着战争形势的不断变化，中美两国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对抗到对峙，最终实现了中美关系的缓和。

本书拟以越南战争为切入点，将讨论的问题集中于越南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上，探讨在这场战争中中美关系的历史演变，意在为全面认识越南战争和深入研究越战时期的中美关系贡献绵薄之力。

— 选题的意义

一般来说，越南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生在亚洲印度支那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以越南为主体战场的两次局部战争，即抗法战争（1945年9月至1954年7月）和抗美战争（1961年初至1973年1月）。本书所说的“越南战争”，主要是指1961～1973年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越、老、柬三国，以越南为主体战场、美国直接军事卷入其中的局部战争。



“二战”结束后，印度支那半岛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先后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1945年9月2日，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在河内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宣告“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成立。但是，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积极在亚洲培植亲美的“第三种力量”，把南越集团当作冷战时期东亚战略棋盘上的重要走卒。1955年10月，坚持反共的吴庭艳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在西贡成立新的政府，当选为“越南共和国”（南越）总统。这样，越南形成了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并最终导致了美国在越南的灾难性卷入。

越南战争，虽然只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场地区性冲突，但无疑是影响20世纪后半叶世界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战后国际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看，越南战争恰好发生在战后国际上各种政治力量的分化与重组，国际格局从两极逐步向多极过渡的承上启下阶段。正是在这个阶段上，中美两个大国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相应的，它们对越南的政策和态度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不能不对越南战争进程产生影响，事实上这种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反过来，中美关系又随着越南战争的推进而起伏跌宕。因此，本书正试图借助于越南战争这样一个平台，梳理这一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演变的脉络，考察中美关系中的越南因素，以及国际环境、国内政治、意识形态和执政者个人等因素的影响，为我们正确地认识当前的世界格局，妥善地处理好中美关系提供一个历史参照系。

二 研究动态综述

中外学界关于越南战争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但是，学者

们的研究往往集中于战争本身和美国的对越政策^①，或者是越南的革命和对美政策^②，而对没有直接参与战争却与战争有着密切关系的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苏联、英国、波兰等国的研究则相对不足。直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才陆续出现了有关论著^③，

-
- ① Hunt, Michael H. *Lyndon Johnson's War: America's Cold War Crusade in Vietnam, 1945 – 1968*,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6); Herring, George C.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 – 1975*, 4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2002); Cooper, Chester L. *The Lost Crusade: America in Vietnam* (New York, 1970); Lewy, Guenter. *America in Vietnam* (Oxford, 1978); Kahin, George McT. *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 (New York, 1986); Young, Marilyn B. *The Vietnam wars, 1945 – 1990*,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1。解力夫：《越南战争》和《越南战争实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韦东、尔雨编著《越南战争：末世启示录》，香港，中原出版社，1992；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 ~ 1968 年），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刘东明：《试论杜鲁门政府的越南政策》，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2 年第 2 期；〔美〕罗伯特·舒尔辛格：《成功的战术与失败的战略：约翰逊政府与越南战争》，参见姜长斌、〔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 ② Duiker, William J.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1. Duncanson, Dennis J. *Government and Revolution in Vietnam*, issu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xford U. P., New York, 1968.
- ③ Gaiduk, Ilya V. *The Soviet and the Vietnam War*, Ivan R Dee: Chicago: Ivan R. Dee, 1996. Qiang Zhai, *China & The Vietnam Wars, 1950 – 1975*,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曲爱国、鲍明荣、肖祖跃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王贤根：《援越抗美实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0；钱江：《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征战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沈志华：《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 ~ 1973）》、杨奎松：《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李向前：《越战与 1964 年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曲爱国：《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均参见李丹慧主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



但对于越战与中美关系的研究，却依然鲜有人问津，更缺乏系统的研究。因此，本书希望能够对此有所补充，以期有助于关于越南战争时期中美关系的深入研究。

1. 国外研究现状

总的说来，对越南战争的研究，国外领先于国内，其中美国是研究最深入的国家。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水平上，美国的研究都处于领先地位。根据美国各大图书馆书目不完全统计，美国有关记述和讨论越南战争的书籍多达 1.2 万余本，有关的专论、小说、杂文和电影更是不计其数，但其研究的重点一般集中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问题。

早在战争正在进行时，美国学者就已经开始了对越南战争的研究，并取得了一批成果，例如：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的《约翰·F. 肯尼迪在白宫的一千天》（1965）、戴维·哈尔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的《困境的形成》（1965）和《最优秀者和最聪明者》（1972）、罗杰·希尔斯曼（Roger Hilsman）的《改变一个国家：约翰·F. 肯尼迪政府的外交政策》（1967）、威廉·W. 考夫曼（William W. Kaufman）的《麦克纳马拉战略》（1964）、理查德·M. 佩弗（Richard Pfeffer）编的《再没有越南？战争与美国内外政策的未来》（1968）、切斯特·L. 库珀（John Cooper）的《失败的十字军：美国在越南》（纽约，1970）、亨利·F. 格拉夫（Henry Graaf）的《星期二内阁：林登·B. 约翰逊时期关于和平与战争的思考与决策》（1970）、马克斯韦尔·泰勒（Maxwell D. Taylor）的《剑与犁》（1972）等。

1967 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S. 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还聘请 36 位专家学者，包括国防部与国务院里文职及武职的专家，以及政府资助的专门研究机构的专家与

学者，组成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美国是如何卷入越南战争的进行系统的研究。经过一年半的时间，他们对 1945 ~ 1968 年美国越战决策进行系统的研究，并形成了 47 册之多的报告书。参与者之一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Daniel Ellsberg)^① ——在越战中目睹了美国在越南战争问题上的种种谎言、欺骗，政府官员对道德与良知的背弃，对总统的盲从和愚忠后，思想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从一个越南战争的支持者转向了一个坚定的反战者。为了结束越南战争，最终他下定决心，冒着终身监禁的危险，将 7000 多页美国对越政策的绝密文件偷偷复印，交给了多家报纸予以发表。这就是著名的五角大楼文件。

在早期的研究著述中，虽然在涉及具体问题时，历史学家们仍然有许多分歧，但他们却几乎一致地批评了美国的越南政策。如当年率先捅出五角大楼侵越战争秘密文件的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就认为，从艾森豪威尔 (Dwight D. Eisenhower) 开始，历届美国总统都有意欺骗人民。

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掀起了一个研究越南战争的高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和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出来。例如：格兰特·夏普 (Grant Sharp) 的《导致失败的战略：越战回顾》(1978)、拉里·伯曼 (Larry Berman) 的《策划悲剧：越南战争的美国化》(纽约，1982) 和《林登·B·约翰逊的战争：在越南陷入僵局之路》(纽约，1989)、约翰·施莱特 (John Schleidt) 的《美国空军在东南亚、南越的战争：主动进攻的岁月 (1965 ~ 1968)》(1988)、迪安·腊斯克 (Dean Rusk) 口述理查德·腊斯克 (Richard Rusk) 整理的《所见所闻》(1990)、

^① [美] 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回忆录》，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http://www.gobook.cn/read/read.asp?id=6969>。



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和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的《担任总统顾问：回忆录》、乔治·C. 赫林（George C. Herring）的《林登·B. 约翰逊与越南：另一种战争》（1994）、戴维·凯泽（Kaiser, David E.）的《美国悲剧：肯尼迪、约翰逊导演的越南战争》（2001）和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五角大楼文件泄密者回忆录》（北京，2005）等。

作为越南战争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于1995年出版《回顾——越战的悲剧与教训》一书，对越南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一石激起千层浪”，也引起了美国朝野特别是越战老兵的强烈反应。虽然麦克纳马拉的观点不甚全面，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例如他在回忆录的最后表示，美国在越南作战的8年是出于善良及诚实的理由^①，但整体而言，这本书的观点尚属公正。他认为，在越南问题上，无论是肯尼迪政府还是约翰逊政府中参与过越南问题决策的人都是按照美国的原则和传统行事的，“是根据那些价值观做出决策的”，“然而，我们错了，彻底地错了”；导致美国人犯错误的不是价值观和意图，而是判断力和能力。但是，1970年代末，以冈特·莱维（Gunter Lewy, *America In Vietnam*, New York, 1978）和提莫斯·劳姆波瑞斯（Timothy J. Lomperis, *The War Everyone Lost And Won*, Baton Rouge, 1984）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即“越战史修正学派”开始为战争进行辩护，他们试图证明越战是符合美国基本利益并且是能打赢的。

目前，美国对于越南战争的评价，主要有四种流行的看法：第一，以当时主导越南战争的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代表，

^① McNamara, Robert S. *In Retrospect: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Random House, 1995, p. 333.

认为美国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低估了越南民族主义力量，高估了自己用现代化手段对付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力量；第二，约翰逊总统的国防部长克拉克·克里福德认为，美国在越南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美国没有全力参战，实际上除了原子弹以外，美国动用了所有高尖端武器，此外还先后派遣 50 多万美国军人直接奔赴越南战场，而是由于美国所支持的南越政府贪污腐化、内讧不已、民心涣散、兵无斗志，最终造成美国在越南不可挽回的败局；第三，曾经担任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国务卿的基辛格则认为，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使美国全国的意志无法集中、政府陷于瘫痪、无法有效运作，这才是美国失败的主要原因；第四，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美国的失败是由战争性质决定的，因为这是一场美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侵略战争，结果不义的战争遭到了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①

在探讨美国对外战略和越南政策的同时，有关美国及其盟国在越战时期的关系也得到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但是，由于缺乏苏联、中国和越南方面的资料，虽然早在 1967 年查哥利亚（Zagoria Donald）就对越战时期的中、苏、越关系有所涉及^②，但是对有关苏联和中国对越南的政策以及中、苏、越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几乎还处于空白状态。即使对于越战时期（1961～1973）的中美关系，据笔者能力所及，至今还没有阅读到专著或有分量的论文。虽然有些论著在叙述越南战争时对中美关系问题有所涉及，但是都过于简略，缺乏深入系统的讨论。

① 《美国为何兵败越南？》（徐进译），《东南亚纵横》2000 年第 10 期，第 23 页。

② Zagoria. Donald, *Vietnam Triangle: Moscow, Peking, and Hanoi*. New York: Pegasus, 1967.



近年来，随着苏联和中国方面新资料的不断出现，美国学者已开始从更深层次上研究越南战争，考察在印度支那冲突中的南越与北越、中国、法国、苏联、韩国以及英联邦与越南战争的关系。如盖杜克（Ilya V. Gaiduk）利用来自俄罗斯方面的新资料撰写了《越南战争和苏美关系（1964～1973）》，史蒂芬·J. 莫里斯（Stephen Morris J.）在《70年代苏联、中国、越南三角》一书中讨论了苏、中、越三国关系问题。^①

此外，一批华裔学者开始脱颖而出，由他们为第一作者或他们与美国学者合作的相关研究成果也不断问世。例如：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兼（Chen Jian）的《毛的中国和冷战》（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2001），不仅对中国和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50～1954）进行了剖析，而且也对1964～1969年中国的印度支那政策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认为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由于自身革命的原因，仅仅是对中越边界的游击力量偶尔支持，越共主要依靠自己进行反法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中国的南部边境，以中国模式推动亚洲革命和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开始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这一时期，中国不仅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物资援助，而且还向越南派出了军事顾问团，积极支持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恢复国内经济，避免与美国再次发生直接冲突，以及在和平共处原则下重塑国际形象，中国和苏联共同努力，于1954年最终达成了《日内瓦协议》，

^① Gaiduk, Ilya V. *The Soviet and the Vietnam War*, Ivan R Dee; Chicago; Ivan R. Dee, 1996; Park, Tong-Chal, Ph. D, *The China factor in United-States decision-making toward Vietnam, 1945 - 1965*, 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1990; David Maylor Purdy, *American Southeast Asian Foreign Policy: Perspectives from Asia*, Xerox University Microfilms, Ann Arbor, Michigan, U. S. A., 1971.

使印度支那问题得以和平解决。正是出于这种战略考虑，1954～1962年，中国对北越解放南越的意图，既不积极支持也不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劝阻。但是，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激进化和中苏关系的恶化，以及美国在越南军事卷入的加深，中国增加了对北越的支持，特别是1965年中国对越南的军事援助急剧上升。尽管如此，由于中国对越南的支持是与毛泽东利用越战造成国际紧张局势，动员广大群众在国内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提高中国在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国际地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中越两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并最终导致“同志加兄弟”关系的破裂。他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赫斯伯格合著的论文《越战初期中美之间特殊的“信息传递”》（《史林》2004年第1期），则对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初期中美之间的“信息传递”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越战发生后，中方通过各种渠道一再向美方发出警示性信息，要求美国不得将战争无限制升级，而美国决策者颇为重视，在己方战略制订中将对方的可能反应当作决策时必须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因此，朝鲜战争式的中美直接军事冲突之所以没有在越南重演，“信息传递”的作用不应忽视。

奥本大学翟强教授（Qiang Zhai）的《中国和越南战争》（1945～1975）（2000年）和《北京和越南冲突（1964～1965）》（国际冷战史项目公报），则充分利用了1980年代末以来中国陆续公布的重要档案文献（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及利用档案撰写的资料性的著作和工具书，特别是江苏省等地方档案，对中国的越南政策进行了详尽的研究，都是目前关于中国对越政策的不可多得的参考书。此外，还有张小明的《秘密战争：中国对老挝的干涉（1963～1975）》、李小兵的《中国和美国：一场新的冷战》和张曙光等人的著作。



2. 国内研究状况

长期以来，中国关于援越抗美的情况一直秘而不宣，直到1979年1月20日《人民日报》才第一次公开宣布中国援越抗美军事行动的情况，因而这一方面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即使有关著述涉及越南战争，也多是从战争本身的角度来考察越战进程或美国的越南政策。

然而，从1980年代末起，随着中国开始公布重要的档案文献，以及利用档案撰写的资料性著作和工具书的陆续增多，中国开始出现研究越南战争的高潮，相继出版了黄铮的《胡志明与中国》（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7），从金的《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王祥思的《援越抗美实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0），施盈福的《秘密出兵亚热丛林》（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郭明、杨立冰的《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解力夫的《越南战争》和《越南战争实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钱江的《在神秘的战争中——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征战记》（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和《秘密征战：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纪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曲爱国、鲍明荣、肖祖跃的《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邹国贤、胡思远的《空中滚雷：越南大空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等。

其中时殷弘的《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一书，利用已经解密和公布的美国政府档案文件和相关资料，运用严格的历史学方法，深入研究了美国侵越战争问题。该书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开始，到1968年越南战争逐渐降级为

止，详尽地检讨了美国的对越政策，着重揭示了导致美国在越南越陷越深的决策过程的种种原因。同时，作者还对美国的军事战略、战争方式、国内舆论，与越南问题有关的国际动态，以及南越政治、军事和社会形势等各个侧面，尽可能给予比较全面的、深入的分析。但是由于缺乏第一手史料，作者对于1968年以后的美国对越政策问题尚未涉及，这不能不是个遗憾。尽管如此，这本书仍然是我们了解美国对越政策的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书。

随着档案资料的开放和部分回忆材料的发表，近年来，国内在越南战争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李丹慧撰有《B同志关于越中关系的报告（档案）——附：黎笋和越南与中国的决裂（节选）》（北京大学现代史料研究中心编《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2辑，2002年7月）、《中苏关系与中国的援越抗美》、《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1961～1973）》、《毛泽东的安全战略思路及其转变（1964～1965）》、《三八线与十七度线：朝战和越战期间中美信息沟通比较研究》、《中国对越美和谈的立场方针及其变化（1965～1968）》、《一场三者互动的智力游戏：引进“批判口述史学观念”——关于协助越南防空作战问题的访谈录、档案文献与学者研究》、《中美缓和与援越抗美：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越南因素》、《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丹慧编著的《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0），不但收录了杨奎松的《毛泽东与印度支那战争》、曲爱国的《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战场的军事行动》、曲星的《中越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的策略差异》、牛军的《60年代末中国对美政策转变的历史背景》和



沈志华的《中美和解与中国对越外交（1968～1973）》等论文，而且还大量附录了“中越领导人关于印支战争等问题的谈话”。依据各种解密档案和新的史料，该书以开放的研究视角，把中越关系放在冷战时期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尽可能地站在一个公允的立场上发表看法，因而成为目前中国学者越战研究的一部力作。

此外，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李向前在《越战与1964年中国经济政治的变动》一文中提出了关于中国与越南战争的新论点。作者指出，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也对越战起着无形的催化作用，为越战对中国经济政治产生的影响做出恰当的定位，从中也可看出当年自感内外受敌的毛泽东，将大政由经济建设扭转为准备打仗的轨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思路。肖宗志的《越南战争与中美关系》则着重论述越南战争扩大化和美国最后不得不从越南脱身对中美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认为越南战争直接导致并加深了中美间的对抗，而结束越南战争、解决越南问题又成为中美关系改善的重要基础，促进了中美两国间的缓和。^①

1990年代以来，关于越战问题的博士论文也不断出现，主要有刘亚东的《越南战争：历史渊源及其国际背景》（1992年）、邓红洲的《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的美国决策》（2002年）、黄云静的《胡志明思想研究》（2001年）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山大学潘一宁的博士论文《中美在印度支那的对抗（1949～1969）》（1998年）对中美在印度支那对抗的动因、两国在第一次越南战争中的较量、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在印度支那重建反共反华战线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还对中美

^① 《中南工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在印度支那走上对抗的原因给予了详细的阐释，从而首开这一时期中美在印支对抗问题研究的先河。

与此同时，东西方学者对发生在印度支那半岛的这场战争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总结。有关越南战争的反思，可参见 P. 伯拉斯查朴编撰的《作为历史的越南：巴黎和平协定后的十年》一书。

2000 年由美国前总统福特主持，一场关于越南战争的研讨会在密歇根州大学举行。在与会代表中，不少都是当年曾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越战的将领和官员。他们在对越战进行反思后认为，主要有四个原因导致美国输掉了这场战争：其一，美国政界和军界在对越南这个国家缺乏起码和必要了解的情况下匆忙出兵，而又没有意识到战争将以美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牺牲为代价；其二，美国政界的粗暴干预，使得军界在整个战争过程中顾虑重重，无法完全放开手脚；其三，美国军界指挥有失偏颇，没能速战速决，“持久战”的损耗倍增，结果导致美国人民反战情绪高涨，战争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其四，美军没有足够多的优势武器卓有成效地取得战争的胜利。^①

2000 年 1 月 10 ~ 12 日，由香港大学历史系、亚洲研究中心、美国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联合组织，在香港大学举行了以亚洲地区学者为主、议题是“关于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美国、俄国、挪威、中国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与会的中国学者大都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中共党史研究室等单位，这些“智库”级中青年学者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角度，深入分析了中

^① 《美国为何兵败越南？》（徐进译），《东南亚纵横》2000 年第 10 期，第 23 页。



国的越南政策，并根据美国、苏联的解密档案，以及越南和中国等相关资料、文献和档案，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秘密，还阐述了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如中国军事科学院的曲爱国认为，中国的介入使美国政府谨慎地决定，不让地面部队越过北纬 17° 线，避免了中美两国陆军的正面冲突。否则，这场战争可能演变成为另一场朝鲜战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丹慧指出，四个三角角力的结局是：中美苏三方都不是赢家，只有力量最弱的越南获得了实际利益，它不但实现了民族统一，而且利用大国间的矛盾，借助苏联实力提高自身的地区性大国地位，从而最终走上“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综上所述，对于1961~1973年美国发动并直接参与的越南战争与中美关系，虽然已有著述对之涉及，但是一般叙述都比较简略，未能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深入研究，至今尚无专论问世。有鉴于此，本人力图借助大量解密的美国历史档案、文献资料，以及相关回忆录和日记，还有前苏联档案资料、中国的最新资料等，对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进行总体的、系统的、综合性的探讨。

三 特色与创新

本书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大量运用了新近发现的原始资料。从美国方面来看，包括美国外交文件（*FRUS*）^①、美国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9 – 1976, vol. I, “Foundation of Foreign Policy, 1969 – 1972”,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2003; *FRUS 1964 – 1968, Vietnam*, vol. I, 1964 (1992); vol. II, January-June 1965 (1996); vol. III, July-December, (1996); vol. IV, 1966 (1998); vol. V, 1967 (2002); vol. VI, January-August 1968 (2002); vol. VII, September 1968-January 1969 (2003); *FRUS, 1964 – 1968*, vol. XXX, China, 1998.